

# 求索的足迹

——记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教授

杜水生 何嘉宁

1949年，共和国刚刚诞生，20岁的吕遵谔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科学发展，才能真正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真正地做到富国强民。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近百年来，列强不仅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也肆无忌惮地猎取大量珍贵文物，因此，如何发展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就摆在了共和国领导面前，也摆在了科学家面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无疑是当务之急。1952年，在著名科学家夏鼐、裴文中教授等亲自参与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置考古

组，同时从历史系本科生中选拔5名学生作为第一届考古专业学员，其中就有吕遵谔先生。可能由于中学时代就对周口店猿人遗址有了一些了解，也可能是从小对自然知识有着更多的喜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从而也开始了他的漫长的考古生涯。

## 师从名家 刻苦学习

4年而壁、挑灯苦熬，北京大学的时代过去了。

19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的吕遵谔师从著名科学家裴文中教授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同时担任考古训练班助教。这是他生命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为他日后从事教学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古脊椎动物研究

室（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名家荟萃，一些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云集于此，如杨钟健教授、裴文中教授等。同时还有大量的藏书和丰富的标本。为了学习鉴定哺乳动物化石，吕遵谔先生把动物的上下左右牙齿分别装在上衣的四个口袋里，以至最后一摸即知是何种动物的第几个牙齿。为了培养动手能力，他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技术精湛的技工师傅学习修理化石、翻制模型。每每谈到这些，吕先生总无不感慨地说：“艺不压身”。后来在研究金牛山人、涿水人、南京人标本时，他之所以能够亲自修复标本、制作模型，皆受益于这一时期的刻苦学习。

旧石器时代考古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时代考古，是因为它是一门横跨文理的学科。它不仅要研究石器和人类化石，还需要有扎实的第四纪地质和地层学古生物学基础。即使在科技测年日益发达的今天，地层古生物学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从1954年开始，吕遵谔先生参加了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陕西蓝田地区第四纪等一系列的调查与发掘，不仅使他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他学到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吕先生回忆说，这一切得益于裴文中教授的言传身教，每一次出野外，裴老都要求我们勤观察，细分析，并不断提出



吕先生在研究室

各种问题，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深化书本知识。同一现象，第一次他会详细讲解，第二次也会给予解释，第三次则要求自己思考。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扎实功底，使自己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

### 实验考古 探求真知

谈及实验考古，这是北大旧石器考古教学与科研的一大特色。当问及原因时，吕先生说：为什么发展实验考古学，这恐怕缘于五六十年代那场关于骨器问题的争论。当时关于周口店中国猿人是否使用骨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碎骨中带有尖和刃的骨化石应为猿人制造或使用的骨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造成骨骼破碎的原因复杂，把这些碎骨定为骨器似为不妥。因为骨骼的质地与石料明显不同，一方面骨骼由于本身具有纵向纤维结构，破碎过程呈螺旋状断裂，很易形成尖；另一方面骨骼既是人类敲骨吸髓的对象，也是鬣狗

等食肉类动物的啃咬对象。因此我们必须获取实践知识，能够区别不同原因破碎骨骼所产生的特征时，才能做出最后结论。如果贸然确认非人类有意加工的破碎的骨骼为骨器，不仅不是科学态度，而且对认识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甚至人类的进化阶段都会出现偏差。因此裴文中教授反复告诫道：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的问题，应慎重考虑。故当《新建设》约稿吕先生参加讨论骨器问题时，他婉言谢绝，并开始用实验解决这一问题，从此确立了他开创中国实验考古学的宏愿。

要开展实验考古学，首先必须具备一些实验条件，一是购买显微镜，二是有一个处理标本的工作室，这两个看似

不难的问题，办起来却相当费力。这是因为考古专业设置在文科，文科教学配置实验设备，在北大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后经多方努力，国家教委特批才购买了第一台显微镜和有关仪器。

1978年，吕遵谔先生招收硕士研究生，经与裴文中教授商议，他为研究生选择了大型食肉类动物啃咬骨骼及敲骨吸髓破损骨骼特征作为研究课题。从此考古系与北京动物园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星期学生到北京动物园将虎狮豹等大型食肉类动物吃剩的残骨取回，处理后进行显微镜下观察，并模仿敲骨吸髓亲手打击骨骼。经过潜心研究，弄清了大



与学生在实验室

型食肉类动物啃咬破碎骨骼的特征，不仅为骨器鉴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实验中获取了一批十分珍贵的教学标本。美国动物考古学家Diane P. Gifford-Gonzalez (冈萨雷斯)在周口店举办动物考古训练班时使用了这批标本。这位著名的教授当时曾表示，要向中国同行学习，亲自动手制作标本。1996年吕先生到美国访问时，在她的实验室里看到的标本，果然就是她回国后亲手制作的。

谈到标本的收集与制作，吕先生说这是一项默默无闻但却十分重要的工作。早在50年代，刚刚执教的吕遵谔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利用业余时间到生物系学习制作动物骨架，80年代后和北京动物园长期合作，将死亡

动物拉回制作标本。在制作过程中，他和学生一起，不怕脏，不怕累，即使在夏天，动物的腐肉臭味熏天，他们也没有中止手中的实验。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旧石器考古教研室的标本已初具规模，有些标本为国内所罕见。

骨器问题初步解决后，吕先后即着手对石器使用进行研究，先后指导研究生完成了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的制作与使用研究，细石叶制作及软锤打片等模拟实验，结合小孤山发现的艺术品和骨制鱼叉，进行制作工艺与使用研究。目前石器制作、使用与研究已延伸到新石器时代。相信这些研究为探索人类逝去的历史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言传身教 教书育人

虽然在建国之初，老一辈科学家就敏锐地意识到人才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在旧石器考古领域，缺乏大量合格的研究人才，一直是制约这门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

此，40年来，吕遵谔先生把他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到这门学科的人才培养上。

由于旧石器考古是一门横跨文理的综合性学科，内容涉及第四纪地质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地貌学，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古人类学，为了使学能获得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除了利用北大较为优越的条件外，从50年代至80年代他一人同时开设了旧石器时代考古、欧洲旧石器时代考古、体质人类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等门课程，并及时将学科的最新动态综合到教学中去；教学内容丰富生动，许多学生多年后仍能回想起吕先生的一些形象比喻，使这些冷僻学科听起来趣味盎然。

除此之外，从50-70年代，吕先

生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为考古专业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史、考古摄影等课程。

即使这样,由于我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常的培养渠道仍不能满足各地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此,吕先生在教学之余还常去各地办速成班。1974-1975年,为配合三峡工程,为沿长江各省举办了两期考古训练班。每期人数达20-30人。1999年3-4月,应洛阳文物局的邀请,70高龄的吕先生对洛阳市全体文物干部进行旧石器专业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办法,一边为学员讲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一边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开展了工作又培养了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需要,吕遵涛教授又担负起培养硕士、博士旧石器考古专门人才的重任,为此他又在课程设计和科研计划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经过十几年探索,目前北大成为国内唯一的旧石器考古硕士、博士培养基地,现已有20多位研究生毕业走向不同岗位,无论是在大专院校,还是科研第一线都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1998年2月为感谢吕先生的培育之恩,来自湖南、安徽、河南、山西、北京等地的20多位研究生举办了吕先生70华诞暨学术讨论会。其中关于湖南玉蟾岩、江陵鸡公山、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的报告都在近年先后跻身于中国考古学十大发现行列。

### 科学研究 重大发现

吕遵涛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一种科研与教学

相互促进的模式。

1960年他赴内蒙古林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可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文化革命开始后,正常教学尚不能进行,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1972年刚恢复招生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为配合三峡工程在湖北、四川进行考古调查,虽然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经常仅有土豆充饥,但在为期二年的洞穴调查中,调查洞穴100多个,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



在工地指导学生

石,其中有的十分罕见。

1975年,内蒙大窑发现一批石器,邀请吕先生前去指导。经过详细的调研,确定了大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

1980年,赴四川资阳发掘。资阳人是解放后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地点,但对其时代,学术界存有异议,这次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1984年,为了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的实习问题,同辽宁省有关单位协商,在金牛山A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这一地点在1974、1975和1978年曾由有关单位进行了几次发掘,已挖至距洞底10米深处。这次发掘,首先清理了以前留下的

发掘现场,后又向下发掘了半米左右,在清理了几件骨化石后,熟悉人体每一块骨骼的吕遵涛教授,当即鉴定出其中一块为人的骸骨化石,并立即指示细心发掘,终于在揭开一大石块之后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计有头骨一个(缺下颌骨),脊椎骨6个,肋骨2根,尺骨、髌骨、骸骨各1个,左右腕骨9个,左右侧掌骨各1个,指骨7件,跗骨11件,跖骨2件,趾骨13件,这些骨骼集中在1.6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无疑属于同一个体。这次发现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发现意义十分重大,获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大学文科重奖。

两年之后,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1987年河北省徐水县文管所进修干部杨永贺在听了吕遵涛先生人体骨骼鉴定课后,记起《涑水报》曾报道过一个农民打地窖时发现“龙骨”的报道。闲聊中,吕先后建议他回去

作一些调查,并尽可能带一些标本回来。当这位干部几经周折找到这位农民时,说大部分骨化石已被一文物爱好者拿走,当杨永贺将剩下的几块带回送予吕先生后,吕先生眼睛一亮,当即判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人类化石,并根据叙述认为农民家里可能还有一部分未发掘出。后经发掘鉴定,除头部为农民敲碎不可复原外,其余部分几乎为一完整骨架,时代测定距今5万年。关于化石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根据髌骨和骸骨的研究,虽然涑水人化石只有5万年,但金牛山人身上所保留的原始性状却延续到涑水人身上。毫无疑问,涑水人的研究对了解东亚地区人类的进化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牛山人发现后,国内学者对金牛

山人的归属及时代、洞穴发育堆积过程提出了不少疑问，为此，吕遵涛教授决不盲从，坚持一切以事实说话，因此1986年正式启动了“金牛山古人类综合研究课题”，由吕先生担任课题组组长，对金牛山人遗址及其附近地区的地质构造、洞穴发育、金牛山人生活时期的古气候、古环境、年代学等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这些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发掘者的最初判断，即金牛山人属中更新世晚期，其产地不是一裂隙，亦无后期堆积干扰，这一论断在1994年东北亚旧石器考古国际会议上得到中外学者认同。

1992年刚刚结束金牛山田野发掘

工作的吕遵涛教授，征尘未洗，即被南京市博物馆邀去鉴定一古人类化石，这又是人类学界一重大发现。1993年底，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发现人化石的汤山葫芦洞进行考古发掘，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吕先生担任队长，主持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又获1枚人类牙齿化石。南京人的发现对了解直立人的面部特征，了解南方地区人类演化历史是不可多得的材料。1998年应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 Henry De Lumley 的邀请，吕遵涛教授访问了法国自然博物馆、人类博物馆等，并准备对南京人化石进行进一步合作研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70高龄的吕先生仍雄心不减当年，在完成《南京人化石地点》专著后，又开始金牛山人的综合研究。我们相信，这些研究对古人类学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学科前瞻 寄语后人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已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和古文化遗址，这一点已为世界同行所瞩目，然而谈到目前现状，吕遵涛教授仍深感忧虑，他指出：从发掘技术看，许多遗址尚不能按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以致许多珍贵资料因缺乏确切地层依据，在研究时失去意义，有的发掘者只顾寻找精品，将大量考古材料弃置不顾。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遗址的发掘水平达不到周口店山顶洞的水平。故提高田野发掘水平乃当务之急。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看，简单的形态分类仍占统治地位，研究者着眼点仍不能“由物见人”。

吕遵涛先生告诉我们，要想在旧石器研究领域取得成就，首先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尤其在田野，没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很可能使重要发现流于疏忽，也可能因没有弄清层位关系，使重要发现失去意义。其次应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不要一切依赖技工，自己亲自动手处理标本，会有更多体验。第三应学好外语，以便能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第四，要勤于思考，注意将书本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栏目主持 / 米武军

吕遵涛与外国专家在一起



在美国 Delaware 大学访问

